

### 誠靜怡與中華基督教會的源起(四) 魯聰言宣教師

#### 合一的實踐行動

中華基督教會在合一的實踐上，可以在其傾向「社會福音」的服務共識中更清楚可見。中華基督教會繼承了自由派神學對社會的關懷，參與不少社會工作。但在積極參與社會工作的同時，內部亦存在張力。其張力來自認同「傳統福音派」與「社會福音派」的兩種路向。這張力的源頭，更涉及兩位領袖，高伯蘭與誠靜怡所主張的立場差異，「高」傾向「傳統福音派」，「誠」則重視「社會福音派」。只是，這兩種看來互相排斥的立場路線，卻暫存於教會之內；更透過立場的不同，增加了兩種路線的相互關注。

能夠容納兩條不同路線同時在中華基督教會內出現，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：(一).當時中國的信徒人口，仍屬偏低水平，信徒人口不多。福音有更廣泛流傳的必然需要，故兩條路線並行，能更擴大接觸社群。(二).當時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，戰亂頻生的時期，繼國共內戰、抗日戰爭亦隨後爆發，社會處於動盪、貧窮、苦難之中，有需要更多的社會實質支援與內在心靈的平安，故兩種福音路線均有實質需要和價值。(三).中華基督教會強調「合一而非一律」的精神，尊重彼此的獨特性，而不是排他以達至「合一」。

再者，兩條福音路線共存除了可以更有效服侍社會有需要的群體外，亦同時擴大了參與合一的群體，凝聚了不同社會組織拓展「服務性的合一」，合作關係不再限於教會以內。當時，其中一項重要的社會工作是建設基督教鄉村，「引領農民歸主」亦定為中華基督教會最要急之事工。

中華基督教會透過與金陵大學農林科合作，開辦課程如「開立農科神學」，培訓領袖，又透過識字班、查經班等教導鄉村教友，先關注農民生活，後再傳福音。至抗日戰爭時期，中華基督教會的服務重點轉移。1937年，全國基督教協進會、華洋義賑會、以及中華醫學會等團體，邀請當時全國總會執行幹事高伯蘭親往山東、河南等地區，與不同的基督教機構商討基督徒

在這國際危機上可參與及扮演的角色。在高伯蘭的努力下，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即發起傷兵服務，並聯同其他教會共同合作。全國總會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，已凝聚起來，成立了 16 個大型協會，87 個區會，2,647 個堂會，300 所中學，55 所醫院。當時中西教牧有 670 多位，信徒達 13 萬多人。這些教會、醫院和學校遍佈全國，龐大教會組織與社會合作，有助推動這傷兵服務計劃。另外，抗日戰爭越激烈，衍生難民問題越發嚴重。1938 年在上海，由各教會團體共同組織的基督教難民救濟委員會成立，全國總會亦是該會成員，高伯蘭擔任義務幹事。當全國總會收到各大協會的救濟捐款後就交予委員會，再由委員會統籌發放各地救濟難民事工所需經費。

從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，「中華基督教會運動」確是取得了空前的成效。由「帝國主義」侵華以來，以西方傳教士為本位的傳教工作，漸漸發展至由華人與西方傳教士共同創會，再邁向華人主治的教會格局，實踐三自教會。在「合一」的大前題下，以高伯蘭的「合一非一律」與誠靜怡的「本色化社會福音合一」路向，共同創建一個以展現自主、多元、合一的中國教會型態，實現在中國的教會歷史之中。同時，亦為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寫下了的重要一頁。

### 參考書目：

1. 陳智衡：《合一非一律 中華基督教會歷史》(香港：建道神學院，2013)。
2. 趙天恩：《誠靜怡與中國教會自立》(新北市：橄欖出版，2017)。

( 全文完結 )